

人格化和神格化：鄭和畫塑像及其歷史形象的建構

鄒振環

摘要 根據各種傳世鄭和畫塑像，以及海內外博物館、展覽館所藏畫塑像史料，從留存的歷史圖片和歷史性畫塑像中精選了富有代表性的鄭和畫塑像，突破傳統鄭和研究中將視野局限在文字文獻，嘗試跨越文本與實物、本土與異域，將視覺材料置於歷史情境裏進行分析。筆者根據畫塑像生產場景和風格不一的特點，將鄭和畫塑像史料分為《西洋記》中為代表的鄭和宦官型、明代戎裝鄭和銅像為代表的武官型，以及域外出現的佛像型和準佛像型、文臣型四類，指出宦官型凸顯宦官群體對專制主義皇權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武官型對應永樂時代宦官通過參與指揮武裝力量介入國家政權的實況，顯示了從本土到域外的軍功威權；佛裝型和準佛像型是域外官方和民間的神格化的產物，建構了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與佛教為主體的宗教之結合；文臣裝則參與了域外在地“去神格化”鄭和形象的塑造。從流傳在域內外的鄭和畫塑像造型的符號化功能出發，討論了鄭和從人像到神像的“神人同形”建構的特點，審視其形象在本土和異域不同區域的分佈，以及與其下西洋偉跡、宗教神修禮儀乃至“去神格化”政治活動的關聯。

關鍵詞 鄭和 人格化 神格化 形象建構 文化記憶

*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鄭和(1371-1433)下西洋是明初一次規模空前、跨越國界的政治、經濟、外交的活動，也是一次作為大航海時代前奏的大型航海探險活動。以 1903 年《大陸報》上刊載的《鄭和傳》和 1905 年梁啟超(1873-1929)的《鄭和傳》為起點的鄭和下西洋之研究，¹ 在過去一百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文字和圖像兩部分，從研究區域上劃分，又可以分為中國本土歷史區域內的鄭和，以及域外歷史文化記憶中的鄭和兩部分。可惜在鄭和研究中，圖像只是文字敘述的附庸，甚至基本上不注意圖像文獻的搜集和研究。

人物畫塑像史料(包括以各種技藝和形式繪製或雕刻塑造的歷史人物形象，本文所重視的是其歷史研究的文獻價值，而非其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是人物圖繪文獻的一部分，和相關文字文獻合成，可以視為一種描述、展現、總結和歌頌歷史人物的生平和貢獻的工具。這些畫塑像見證了歷史人物的生命和貢獻，形成文字記憶之外的一種思想及文化交流的手段。事實上，鄭和下西洋研究中尚缺乏關於鄭和視覺記憶的論著，真正意義上的視覺文化應該把歷史上與鄭和相關的圖繪，如服飾、食物、船舶樣式、動植物、園林建築的外觀，戲園表演、禮儀慶典等，都作為視覺文化活動的機制加以討論。海內外華人社會，上至政府，下至民間，以傳記、書志和建祠、立碑、刻銘等形式的傳承建構，使鄭和下西洋的事蹟影響與精神傳承的空間不斷擴大，鄭和形象的建構是明代以來歷史英雄人物記憶的典型代表。以往的鄭和研究多重視鄭和下西洋的文字資料，或從藝術史的角度切入有關畫塑像創作中的藝術價值和美學意義，而很少從文獻學角度將之作為一種類型的史料加以歷史的解讀。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文字歷史記憶的成果已經汗牛充棟，而有關鄭和畫塑像歷史記憶的部分，一是比較分散，二是在研究中多作為文字記憶的輔助部分而出現，較少將之作為重點分析的對象。

學界關注鄭和下西洋的圖繪史料並以之為主，輔以文字記憶的研究成果，最早有 1985 年中國航海史研究會出版的《鄭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紀念(1405-1985)》一小冊子，² 其後有李菁菁主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台北經典雜誌，1999 年)，胡廷武、夏代忠主編《鄭和史詩》(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編《鄭和下西洋》(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 年)。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以文字描述為主，輔以圖繪，首次較全面、系統地介紹和研究了海外 17 座鄭和寺廟，對海外有關鄭和的傳說、機構、論著和紀念活動等也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該書把實地考察與研究海內外文獻結合，揭示鄭和下

1 鄒振環：〈《支那航海家鄭和傳》：近代中國研究鄭和第一篇〉，《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 期，頁 146-153。

2 該書承黃慧珍教授惠賜，特此鳴謝。

西洋在海外(主要是東南亞)影響的特點、歷史軌跡和意義。雲南省晉寧縣徐克明編《鄭和像集》是目前惟一一本有關鄭和圖像的集結，編者在四十餘年間從國內外搜集了包括國畫、油畫、木刻、泥塑、石雕在內的鄭和圖像，共計 93 幅。該書搜集圖像的思路有獨特之處，可惜收錄的圖像質素較差，幾乎沒有能夠被引用作為鄭和圖像研究的資料。³

討論鄭和形象的歷史建構的單篇論文，筆者所見惟有周如燕、樓慧珍的〈《西洋記》插圖中的鄭和與王景弘〉，該文利用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三山道人的刻本中的鄭和與王景弘(1368-1398)的圖像，從外貌、服飾、性格特徵諸方面討論了該版《西洋記》插圖的風格特點，指出該版構圖處理極具舞台感，刻畫人物動態誇張，服飾體現了明萬曆年間的時代特徵。不過該文並未解釋為何同為太監，鄭和無須，王景弘則為美髯公。⁴

1990 年代，西方世界為了慶祝著名的探險家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等，也有一系列的活動。2005 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普塔克(Roderich Ptak)推出德文版《鄭和：圖像與認知》(*Zheng He: Images and perceptions*)一書，認為歷史上技術先進的中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引擎”，主導着不少探索與交流活動，這些活動是和平的，促進了不同文明間的交匯融通。他着眼於此類圖像，精選文學作品如《西洋記》中的鄭和圖像，與早期伊比利亞文本的伊斯蘭圖象比較，指出鄭和及其周緣資料至今仍讓歷史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甚至政治家感到着迷，引發許多傳說和故事，通常都具有政治和宗教的意義。⁵ 2014 年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推出美國麥克·山下(Michael Yamashita)著《鏡頭下的航海史詩》，通過照片將鄭和每一次航行的細節全部展現出來，書中精選 254 張高清圖片，再現明朝航海家鄭和的航行之路，以及沿途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風土人情，不過該書的重點並不在討論鄭和的畫像史料。⁶

根據各種傳世鄭和畫塑像，以及海內外博物館、展覽館所藏畫塑像史料(包括部分根據原塑像史料或口述文獻重塑的鄭和塑像)，筆者從留存的歷史圖片和歷史性畫塑像中精選了富有代表性的鄭和各類畫塑像，突破傳統鄭和研究中將視野局限在文字

3 感謝時平教授提供此書，本文有多幅圖片承時平教授提供，特此鳴謝。

4 周如燕、樓慧珍：〈《西洋記》插圖中的鄭和與王景弘〉，《鄭和研究動態》(上海鄭和研究中心主辦)，2015 年 7 月 30 日第 2 期。

5 Claudine Salmon and Roderich Ptak, eds., *Zheng He: images & perceptions/Bilder und Wahrnehmungen* (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Asia, v. 15).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5).

6 (美)麥克·山下(Michael Yamashita)著，王寅譯：《鏡頭下的航海史詩》(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4 年)。

記憶類型的模式，嘗試跨越文本與實物、本土與異域，而將視覺材料置於歷史情境裏進行分析。留存下來的鄭和畫塑像文獻可謂五花八門，筆者根據畫塑像生產場景和風格不一的特點，將鄭和畫塑像史料分為《西洋記》中為代表的鄭和宦官型、明代戎裝鄭和銅像為代表的武官型，以及域外出現的佛像型和準佛像型、文臣型四類。按類型指出宦官型凸顯宦官群體對專制主義皇權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武官型對應永樂時代宦官通過參與指揮武裝力量介入國家政權的實況，顯示了從廟堂到民間、從本土到域外的軍功威權；佛裝型和準佛像型是域外官方和民間的神格化的產物，建構了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與佛教為主體的宗教之結合體；文臣裝則參與了域外在地“去神格化”鄭和形象的塑造，最後從流傳在域內外的鄭和畫塑像造型的符號化功能出發，指出從人像到神像“神人同形”的建構，審視其形象在本地和異域不同區域的分佈，以及與其下西洋偉跡、宗教神修禮儀乃至“去神格化”政治活動的關聯。

本文旨在按鄭和畫塑像類型展開分析，一是盡可能對既存的畫塑像史料考鏡源流，考訂本土和域外歷史文獻中鄭和形象的建構過程；二是通過對歷史上鄭和畫塑像的演變，討論域內外鄭和神像崇拜的不同側重點，以圖像學(iconology)分析方法揭示歷史上鄭和畫塑像建構背後的文化機制；三是梳理與展現鄭和畫塑像作為史料的象徵意義，探究在本地與異域鄭和形象塑造過程中不同文化系統如何參與符號化圖像的生產和建構，分析其中人格化和神格化處理牽涉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意義。希望本文論述有助於增強鄭和研究中圖像分析的面向，以鄭和標誌性形象拓展史料空間，為推進本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貢獻綿薄之力。

一、《西洋記》宦官型鄭和形象及專制皇權的影響力

明清小說中卷頭只畫書中主要人物肖像的一般稱為“繡像”，每回故事有插圖者稱“全圖”、“全像”或“回回圖”。明刊本書名為《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1597年，以下稱《西洋記》)者，每回有圖2幅，共計198幅插圖，其圖頗為古雅。目前已知最早的鄭和圖像源於明萬曆刻本(圖1)。作者羅懋登將鄭和七次奉使西洋描繪成神魔小說的史蹟，希望以此激勵明代君主，能夠勇於抗擊倭寇，重振國威。

關於鄭和本人的形象，明成祖的術士袁忠徹曾在《古今識鑑》(1451年)卷八中有文字描述：稱其“身長七尺，腰大十圍，四嶽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後以靖南功授內官太監。永樂欲通東南夷，上問：‘以三保領兵何如？’忠徹對曰：‘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遂令統督以往，所至畏服焉。”⁷至羅懋登撰《西洋記》，其中

7 袁忠徹編：《古今識鑑》，卷八，轉引自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上冊，頁21-22。

十五回通過大臣劉誠為皇帝描述了鄭和：“臣觀此人，若論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長，必為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財寶滿倉箱。若論他的面部，正是面闊風頤，石崇擅千乘之富；虎頭燕頤，班超封萬里之侯。又且是河目海口，食祿千鍾，鐵面劍眉，兵權萬里。若論他的氣色，紅光橫自三陽，一生中須知財旺。”⁸

雖然鄭和生前沒有留下任何畫塑像，後人無從了解鄭和的真實樣貌，但上引《古今識鑑》及《西洋記》卻通過文字傳承了部分關於鄭和形象的歷史記憶。後者通過對鄭和相貌和服飾的描述，與插圖中的形象結合對照，提供了歷史上第一個相對完整的鄭和形象，即鄭和從小聰明機靈，相貌端莊；選入燕王府後，忠實果敢，英勇善戰，深受朱棣寵信；其身負重任，七下西洋，不辱使命，不畏艱辛，為國揚威，聲名遠播，奉獻終身。《西洋記》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圖文資料，是明代第一個對鄭和形象進行人格化塑造。他不是一個猥瑣太監，既似文臣，又是武將，開創了歷史上鄭和形象最初的文武雙全的文本。袁忠徹在《古今識鑑》中吹噓朱棣讓他為鄭和看相，最終選定鄭和為下西洋的統帥。但是他“歷言罷下西洋”說明他並不贊同下西洋，對朱棣命令大肆造海船，以圖進一步的航海，也不斷提出反對意見。⁹

《西洋記》中的插圖反映了晚明時的鄭和形象，一方面有書坊主及其雇傭的插圖繪者對鄭和樣貌的想像，同時也滿足了社會群體記憶對鄭和這一文武雙全的形象的期待。其中第四十六回特別描繪了鄭和的服飾裝扮：“頭上戴一頂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領簇錦蟒龍袍，腰裏系一條玲瓏白玉帶，腳下穿一雙文武皂朝靴。”¹⁰三山帽(中官帽)是明朝宦官所戴的帽子。晚明劉若愚《酌中志》討論太監的服飾，其中記載“圓領襯擺，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乾清宮管事之耆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西洋記》所述鄭和身上穿一領簇錦蟒龍袍，顯然與“賜坐蟒補”相符；《酌中志》卷十九又載：“自太監而上，……特升，方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則頂妝玉帶也。”“靴，皂皮為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聖上履全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加粉飾，敝則易之凡。”¹¹可見小說中“玲瓏白玉帶”和“文武皂朝靴”的說法有所依據，也顯示鄭和並非一般的太監裝束。按照明朝官制，其官位或相當於正一品或從一品，在朝中地位很高。《西

8 羅懋登著，陸樹命、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93。

9 張廷玉(1672-1755)等：《明史》，載《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第10冊，“方伎傳·附見袁珙傳”，卷二九九列傳一八七，頁8607。

10 羅懋登著，陸樹命、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頁593-594。

11 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卷十九“內臣佩服紀略”，頁165-176。

洋記》一書塑造的鄭和形象，為之後鄭和崇拜在中國境內外的存在和流傳，特別是流傳到東南亞一些國家供奉三保大人鄭和形象的創制，提供了第一個重要的樣本。

宦官型鄭和在鄭和畫塑像的傳承中有自身的一個系列，多在沿海地區發現。如福建漳州雲霄寅錢寺內鄭和木雕像，這是天地會創立者鄭開（鄭開又稱提喜和尚，1711-1779）第一處寺廟。寺內原來供奉一尊鄭和木雕神像，是閩南地區“太保公”鄭和信仰的見證物。該木雕高 52 釐米、寬 28 釐米、厚 20 釐米，取材樟木，系明末清初作品（圖 2）。鄭和呈踞坐狀，身着官服蟒袍，氣勢威嚴不凡，面部祥和，其外服寬袖，大前襟的裝飾風格，頗顯閩南特色。¹²

據稱源自海南文昌的一尊鄭和鐵像也屬於宦官型系列（圖 3）。此尊鐵像高 40 釐米、寬 28 釐米，重 4 公斤。鄭和面如滿月，表情慈祥，丹鳳眼，大耳垂肩，端坐於龍鳳呈祥墩上。頭戴一頂菊花紋三山官帽，腳穿一雙軟底快步戰靴，外穿一領大袖軟網官袍，內着蟒龍鎖子甲戰袍和鎧甲，腰間系一條玲瓏白玉帶，右手托帶於胸，左手托一大元寶。兩腳間放置三枚大元寶，右腳外另置一枚大元寶。眉清目秀，無胡無須，體態豐腴，形身自若，神態可掬，凸顯明中期前後的風格。塑像背後二枚鑄造鈐印，一枚鈐印為橢圓形龍紋，下方一枚方形鈐印，因銹蝕無法識別。像身塗有朱漆，可能為祭祀和為辟邪摸紅所致，已多有脫落。面相右臉側鏽裂，痕跡雖深，但仍不失完整。此尊造像老坑深鏽、寬衣博帶、三山官帽，屬明式宦官裝。¹³

目前存世的宦官型鄭和塑像不但有坐像，也有立像。其中之一為雲南皓珺博物館藏宦官裝的鄭和銅像（圖 4）。像高 34 釐米，由全身站立像及底座須彌台兩部分組成，人物立像高 30 釐米，底座高 4 釐米，長 12 釐米，寬 11 釐米。銅像重 2.5 公斤。造像成正面立像，頭斜視成二分面像，雙手向前拱起放於胸部成作揖狀。此尊銅像出自昆明市官渡區一戶農家，其祖輩們視“鄭公公”為海神，每到下滇池或出海打魚時，會拿出來供奉。經專家綜合鑑定、論證，根據鄭和銅像包漿、服飾、冶金工藝、鑄造藝術、人物構造等諸因素，可以確定該銅像應為明代的出品。¹⁴ 另一尊鄭和站姿塑像藏於寧波港口博物館（圖 5）。雕像系精美黃楊木雕，也是頭戴三山帽，身穿蟒袍，腰

12 該鄭和雕像於 1980 年代一度遺失，後經多次輾轉，發現流失於漳浦，由雲霄收藏家協會龔楠購得，再轉讓給羅建章收藏。相關信息見〈收藏家愛心捐贈 丟失近 40 年的寅錢寺“鄭和雕像”回家〉，《閩南日報》（2019 年 4 月 23 日）。

13 關於該鐵像的介紹，見宋靜敏等：〈鄭和鐵像考釋：明朝時期海南島文化豐富〉，《海南日報》（2012 年 4 月 16 日）。

14 該銅像曾在昆明市潘家灣文化藝術收藏市場以拍賣價 400 萬成交，參見徐克明：〈鄭和故鄉發現明代鄭和銅像〉，《鄭和研究》，2007 年第 1 期。目前該銅像為雲南皓珺博物館收藏。參見雲南皓珺博物館：《皓珺第八十一輯——偉大的航海家：鄭和銅像》（2019 年 6 月 13 日）。

系玉帶，腳蹬朝靴，雙目微下視，炯炯有神，栩栩如生，與《西洋記》中描述的鄭和形象類似。

宦官裝是鄭和形象建構中最主要的一類。宦官是中國皇權制度的衍生品，高高在上的皇帝希望在個人私欲與掌控權力之間找到平衡，常常依賴宦官這一特殊群體。明朝宦官起勢於永樂朝，朱棣憑藉鄭和等宦官的幫助，成功驅趕朱允炆坐上了皇帝的寶座，為了平衡朝內勢力，宦官自此登上權力的舞台。“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¹⁵ 永樂時期，宦官地位大大提升，鄭和、侯顯、馬騏等宦官開始嶄露頭角，朱棣設立東廠，由親信太監主持，這可以看作是對宦官幫助其登位的一種報答，也可視為上層權力中樞的一種調整。永樂朝的外交活動都由正使太監、副使監丞、少監等領銜，承擔奉使海外的重任。¹⁶

宦官裝鄭和塑像在大陸沿海地區多有發現，曾有報道在福州民間看到一座高約 40 釐米，底座為一正方形、邊長約 20 釐米鄭和木雕像，鄭和端坐在一張雙頭蟒首木椅上，頭戴官帽，雙目平視前方，臉頰微胖。上身有一披風，衣服上有如意雲彩配飾。雙手着揖，腰繫一條玉帶。該像表層有不少金箔，但脫落殆盡。據記者了解，長樂至少有四處曾保留過鄭和的宦官型雕（塑）像。從其中有兩尊木雕、一尊石雕和一尊彩繪泥塑。¹⁷ 上述宦官型系列的鄭和塑像，從服飾看都是頭戴三山帽，身穿大紅蟒袍，腰繫玉帶，腳穿皂朝靴，同《西洋記》中描述的鄭和形象大體一致。無論是鐵像、銅像，還是彩繪木雕像，造型多為深棕色眼球，棕褐色頭髮和眉毛；部分頭髮是捲曲的黑髮，面龐圓胖，長鳳目、方臉、面寬，雙下巴，方口（唇形適中）無須，嘴唇飽滿寬廣。從造型看，有男人之形而無男人之威，與歷代文人所崇拜的文臣裝（即文曲星）相區別。或有質疑為何宦官型塑像會指向鄭和呢？因為明代宦官能被後人提及的著名宦官只有鄭和及魏忠賢兩人，且後者從明代起多具負面的評價。永樂朝宦官在權力中樞中地位的提升，表面上看是宦官這個群體在權力生態中的變異，但本質依然是明成祖皇權擴大的連帶效應。因此，以宦官型鄭和畫塑像為代表，目的是在展示和強化長期隨侍皇帝左右宦官手中的權力，凸顯宦官對專制主義皇權潛移默化的影響力。

15 張廷玉等：《明史》，“宦官一”，卷 304，頁 8621。

16 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頁 45。

17 祝勇：〈疑為明代鄭和木雕像現身〉，《福州新聞網》（2009 年 3 月 25 日），取自 <http://news.fznews.com.cn/ktss/2009-3-25/2009325XRC4REX+ON75013.shtml>，2021 年 12 月 7 日擷取。

二、明代域內外戎裝樣貌的宦官型鄭和塑像

武官型鄭和形象與鄭和本人的軍事生涯密切相關。他知兵習戰，被明成祖授予“欽差總兵太監”的軍銜。¹⁸ 他率領下西洋的艦隊多達兩萬餘人，動用的二百多艘船隻中，戰船有一百多艘，軍事人員有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旗校、勇士等。為打擊海盜，保護南海諸國遣使入貢，開闢一條安全的航道。鄭和船隊也裝備有各種類型的武器，如冷兵器有弓弩、標槍、砍刀、梨頭標、小標等；燃燒性兵器有火球、火蒺藜、火槍、鐵咀火鷄、煙球等；爆炸性有鐵火炮、神機石榴炮等。¹⁹ 所以，早在明代就已經出現鄭和戎裝的武官型造像。2021 年在上海匡時秋拍賣的明代鄭和武官銅坐像，高 40 釐米，面部圓潤富態，神態慈祥，少了幾分威嚴和剛毅的男子漢形象，年輕無鬚鬚則表示宦官身份（圖 6）。然而，鄭和身着蟒袍、白玉腰帶高至胸部，更顯出他作為朝廷武官的顯赫身份。明代蟒袍是一種皇帝的賜服，由皇帝專門賞賜給內使監宦官、宰輔等達官貴人的武官型。蟒服與皇帝所穿的龍袞相似，所繡的蟒是一種形如龍的四爪龍。明永樂二年（1404）明成祖因馬三保戰功卓著賜鄭姓，官至四品內官監太監，地位僅次於司禮監。故此鄭和塑像上的蟒袍戎裝格外醒目。²⁰

明朝以後，武官型鄭和像在域外地區日益盛行，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麻六甲三寶山（一作三保山）的西南山麓上的寶山亭有一尊武官型的三保公鄭和像，當地人稱之為“三保廟”鄭和像（圖 7）。²¹ 據說 1685 年華人甲必丹李為經集資購買作為麻六甲華人的墳山，1795 年華人甲必丹蔡士章（1750–1802）為掃墓者建有寶山亭。亭內原設有三個神龕，分別供奉三寶神像的神位，陪祀的有劍童、印童，另外兩尊為天后聖母（即媽祖）與福德正神（即大伯公）。亭中有最聞名的數口直徑逾二米的水井，為麻六甲歷史上最古老的大水井，華人傳為鄭和船隊駐紮此地時為補充淡水而開掘，故稱“三保井”，據說井水可療疾。當年寶山亭中供奉三寶神像，是一尊威武英明、揚威西洋的英雄武官型的形象，恰好回應了華南移民初到番邦打拼與惶恐交雜的心態，感念鄭和，並將他威武的形象神聖化，期盼獲得神靈護佑，以求更好地

18 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頁 28–29。

19 唐志拔：〈試論鄭和船隊裝備的武器〉，《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 50 期），頁 204。金國平還對該文中提及的“大發貢”、“大佛狼機”和“鳥嘴銃”等進行詳細的考訂，參見〈鄭和船隊冷、熱兵器小考〉，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 年），頁 378–393。

20 喬鵬：〈上海匡時秋季拍賣會〉，《宮廷藝術》（2021 年 12 月 23 日）。

21 廟內據史料記載，處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要道的麻六甲，是鄭和船隊在海外的重要基地，鄭和留下的航海圖在麻六甲標有“官廠”的字樣，即存放貨物的倉庫。蘇慶華：〈馬來西亞的“鄭和記憶”及其在當代的意義：從鄭和廟和鄭和“遺跡”切入的討論〉，曾玲主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70–91。

適應在番邦異域艱險的生存環境。

武官型的鄭和形象深入人心，所以在 1981 年三寶廟的鄭和像被竊之後，當地華人發起了神像重建活動。該石像是以南京的鄭和公園的武官型鄭和塑像為模本，由麻六甲中華商會 1990 年向中國泉州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訂製，中華大會堂支付費用，福建惠安石雕廠費時五個月雕成。石像身着長袍，手握寶劍，雙目圓睜，身高 3 米，寬 1.8 米，重達 11 噸（圖 8）。1991 年 5 月 21 日，石像被運抵麻六甲，原計劃將其豎立在寶山亭後，但當地政府擔心把回教徒鄭和的塑像放在佛教墳山的三保山，成為華人膜拜的神像，在清明節等日子華人供奉祭品，與回教的教規相抵觸。鄭和石像放在此，也有人誤以為他是墳山亡靈的守衛者。面對種種阻力，鄭和塑像被鐵籠罩住，移入汽水廠停車場，擱置 12 年之久。2002 年底，麻六甲政府終於將擱置在停車場的鄭和石像解除鐵籠，洗去塵土，加上底座，安置在聖保羅山鄭和文物紀念廊。²²

另外，馬來西亞東北部有一州名登嘉樓（舊名丁加奴），位於日朗河畔的諾來村（當地華人稱諾來村為“三保港”）有一座三寶公廟。十五世紀鄭和曾經來過登嘉樓港，船隊在日朗河畔擱淺，鄭和一行曾在此地留守。1942 年，登嘉樓華人在此地建立了一座三寶公廟，廟中的鄭和也屬武官型塑像，身着一襲圓形沿口的盤領，窄袖大袍，以紅赭色為主色調，俗稱“雜色盤領衣”。袍服的胸前繪有蟠龍，這是明代武官服飾中最有特色的裝束。1970 年代該塑像曾被盜走，後依樣重塑塑像。²³

1402 年至 1403 年內戰期間，已有許多宦官展現軍事長才，且在秘密情報工作上為永樂帝奪權立下大功。1403 年起，永樂帝指派精於戰術的宦官到邊疆、沿海等地，對其頑敵進行軍事鎮壓。1407 年鄭和出使，途經舊港（即三佛齊國，今印尼的巴領旁），稱霸海上的海盜陳祖義率船隊試圖偷襲劫掠。鄭和在海戰中生擒陳祖義回朝，“由是海內振肅”，從此太平。1415 年鄭和船隊歸國途中，因蘇門答刺國王宰奴裏阿必丁的申訴，生擒領兵作亂的部落貴族“偽王”蘇幹刺，達到了“諸番振服”的效果。²⁴ 這些武功使得鄭和名振海內外，其武官型塑像的出現和流行，正反映出普通民眾對鄭和勇武事蹟的歷史記憶。

22 曾玲：〈當代東南亞的“鄭和”詮釋〉，載曾玲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207–210。

23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76–181。

24 同註 15。

三、異域神格化佛裝型和準佛裝型鄭和塑像

如果說宦官型和武官型的鄭和像離不開歷史與世俗文化的關懷，受到佛教影響的佛裝型鄭和形像則是向宗教信仰的精神需求靠攏。佛教造像的種類繁多：一諸佛，如釋迦牟尼、彌勒等佛像；二菩薩，如文殊、普賢、地藏等；三羅漢，如迦葉、阿難、十八羅漢等；四明王，如孔雀、五天神、托塔等；五高僧，如馬鳴、龍樹、竺法蘭等。雖然佛像的形象風格各異，通行的造像或依經說，保持外來的風貌，同時結合當地原有和新出現的神明形象。²⁵ 十五世紀以後東南亞和印度社會歷史發展變遷過程中，鄭和塑像有神格化的趨勢，鄭和下西洋同時伴隨着中華的宗教文化在東南亞和印度的傳播，在地的華人移民在遷徙地漸漸形成對國家與文化所在國的文化認同，以及華人與馬來人、印度人、當地土著等在內的多元種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系環境之中，既有互動交融，又有矛盾衝突。在地華人移民把當年以鄭和作為擁有中國官方強大力量的代表，於是，鄭和這一歷史人物得到了神格化的加工，被視為開拓異域的先驅神祇，成為東南亞華人民間信仰本土化形塑的一個特徵。

泰國曼谷的三寶廟祭祀的就是最典型的佛裝型鄭和像。這座華人建造的三寶公廟坐落在阿瑜陀耶城郊，瀕臨湄南河。該廟泰名“帕南車寺”（或稱“帕楠成寺”），初建於 1324 年，較之阿瑜陀耶王朝在這裏建都還早了 26 年。帕南車寺一帶是華人的聚居區，亦是重要商業貿易集市。1407 年、1409 年鄭和第二、三次下西洋，曾用小船載貨到這裏周圍進行交易。為了紀念鄭和，1617 年以前當地華人將帕南車寺改稱“三寶公廟”，並把鄭和崇拜為佛，把寺廟內的原有的鑾抱多佛改稱為“三寶佛公”，是泰國最大的一尊金屬鑄像（圖 9）。該佛像高至暈頂 19 米，寬 14 米。明末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中有記“禮拜寺”，稱其為“永樂間鄭和所建寺，甚宏麗，佛高與屋齊，”²⁶ 即指鄭和建寺造佛之事。1767 年緬甸軍隊攻陷阿瑜陀耶城時，因三寶公廟位於市郊，倖免於難。泰國歷史上第三個王朝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吞武里”為其首都，1769-1782）和延續迄今的曼谷王朝（1782-）都曾加以修葺。現今的三寶公廟是按照泰國傳統佛寺佈置，大殿前有一長走廊，與前殿相接。走廊正中放置供桌，上面有三隻銅香爐，分別鑄造於光緒和宣統年間。正殿大門上端有“三寶佛公”木匾，兩旁是中文對聯。此尊“三寶佛公”形制巨大，一個指頭較普通人的身高還長。²⁷

25 高觀如：《中國佛教造像》，載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6-84。

26 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36。

27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90-191。

泰國的三寶公廟共有三座，除上述帕南車寺，還有位於曼谷以東 80 公里北柳的烏拍寺，該寺建於十九世紀的主殿供奉三寶佛像，高 15 米，寬 6.5 米。旁有玄天大帝、地藏王菩薩和觀世音等配祀，顯然受到中國佛、道神明同寺祭祀的影響。另外，張燮《東西洋考》稱“三寶廟在第二關，祀太監鄭和，”²⁸ 應指吞武里的彌陀寺，位於今曼谷西邊的吞武里區，當地華人稱之為“三寶廟”，該廟中的彌陀佛原本與鄭和無關，後來華人在彌陀佛側豎立“三寶太監”神位，把佛像與鄭和聯繫起來。現存的佛像建於十九世紀，外觀形象來自泰國素可泰時期的佛陀造型，單腿盤坐，頭頂佛光呈火焰狀。²⁹ 既有的兩座大小各異的鄭和佛裝像服飾瓔珞莊嚴，有笈多式藝術（Gupta art）取向。

海外鄭和廟的總數大約有六十處，其中保存的很多鄭和塑像屬於準佛裝型。例如印尼東爪哇首府泗水有座三保廟，又稱 Mbah Ratu 廟，裏面供奉一座“三寶公”金像，有類似佛陀頭頂的肉髻，面龐豐腴祥和，似進入禪定，臉部形象卻又介於神格化和人格化之間，頗有中國江南佛陀造像的風格。左右兩側供奉四尊佛陀、神仙和聖物，左側分別為釋迦摩尼、土地公；右側是“神櫓”，長 6 米，直徑為 60 釐米；塑像後面有一個大鐵錨，據說都是鄭和船隊的遺物。³⁰

上述幾種佛裝型塑像做了神格化的處理，而其他還有不少是接近鄭和宦官型的裝束，不過在造型上有着明顯的當地民間神靈，如大伯公之類的造型特點，我姑且將之稱為準佛裝型。這些準佛裝型鄭和造像多與當地民間傳說結合，如鄭和與印尼巴厘島荔枝、花生、白蔥的傳說。在這些傳說中，鄭和被賦予許多超自然的神力，不僅可以造山造島——現今東南亞的一些山與島就是因鄭和神力而出現，還具有鎮妖魔鬥鬼怪、治病救人等超自然的威力。

在鄭和誕辰日或抵達某地區的紀念日，還會舉行不同形式的宗教儀式和慶典活動。印尼爪哇島有多座三保廟，如井里汶附近有宋加拉基廟，傳說是鄭和一夜間建成的。首都和最大城市雅加達安左岸邊有一座“三寶隨屬”的小廟，據傳此廟是為紀念鄭和船隊的一名廚師及其妻子而建的神廟（又稱“龍更廟”）。印尼雅加達卓爾地區也有一座“三保水廚廟”（又稱“忠義船之廟”或“浪迎廟”）。這位廚師因愛上名叫希迪瓦蒂的舞女而自願留下，並與她結婚。當鄭和再來時，廚師夫婦皆已去世。廟的規模不大，但陳列了兩把利劍，據說是鄭和的遺物。其中供奉鄭和神像、三保水廚神像、三保水廚夫人畫像等。在有關鄭和神話傳說中，與東南亞民間習俗、動物與物產

28 張燮：《東西洋考》，頁 36。

29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92-193。

30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66-168。

有關的內容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位於中爪哇三寶瓏的三保廟，其規模要比三保水廚廟大得多，迄今紀念鄭和的活動也相當頻繁，香火不衰，一年多達 18 次。³¹ 這些傳說和儀式在漫長的歷史演化中世代延續，成為當地信仰習俗的一部分。

在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流傳着不同形象的準佛裝型的神格化鄭和塑像。有不少地區是以鄭和命名的，如印尼爪哇省首府三寶瓏（印尼語：Kota Semarang，也稱“什瑪浪”）。“三寶瓏”的中國名字是華人為紀念三保大人鄭和，根據印尼語的諧音取的，也是世界上惟一一座以鄭和命名的城市。三寶瓏有三寶洞（或三保洞），其中供奉有“三保大人”像。這些神像雖不屬嚴格意義上的佛裝型，但在頭部肉髻的塑造和臉部造型上，又明顯留有濃厚的佛教彌勒佛塑像的影響。1704 年三寶洞因遭暴風雨而塌陷，原來的鄭和雕像毀壞，新塑像是直接從中國運去，高 80 釐米，身穿明朝官服，面龐豐滿圓潤，人們把這座鄭和雕像稱為正本“大三保”（圖 10）。副本是建於 1746 年的大覺寺中的鄭和像，俗稱“小三保”（圖 11）。農曆六月廿九日，人們把“小三保”抬到八人大轎上，敲着震耳欲聾的大鑼，巡遊隊伍抵達三寶廟後，將“小三保”放在“大三保”對面，以獲取“神力”。³² 通過這種宗教性社會儀式，不斷重現和強化世代相傳的關於鄭和的記憶。

位於西馬來西亞西北部檳城的峇都茅（Batu Maung）漁村小鎮，這裏的漁港邊有一座“鄭和三保宮”，據說是鄭和托夢給當地漁民，讓他們為他建一座香火延續不斷的廟宇，其後漁民在此地又發現了鄭和當年留下的腳印，當地的漁民為了得到神靈的保護，二十世紀 90 年代建成的這座“鄭和三保宮”，如東南亞的許多鄭和廟宇一樣，當地華人以此來祭拜先人前輩，祈求生活的安定、幸福。宮名以爪夷文和英文書寫在廟宇兩側。英文為“Sam Poh Foot-print Temple”，兩旁牌坊對聯為：“四海沐天恩鄭公當年來探勝，石崖留足印晚輩此日復登臨。”殿內供奉了鄭和石雕神像，頭戴太監帽，身型豐滿，一手握着望遠鏡，另一隻手的掌心五指向上，手中放置一塊金元寶（圖 12）。殿內空間不大，除了安置鄭和像的木質神龕外，內殿中央有一個類似圓型坑井的窪地被鋼杆包圍着，坑內傳說是當年鄭和留下的大腳印，長約 1.2 米，寬 0.5 米，傳說是鄭和下西洋期間曾來此訪問，留下腳印。清光緒十五年（1879），黃志信在三保公廟佈施並立碑。³³ “每逢朔望，善男信女，詣洞參神，用申悃懣，肩摩踵接，車轆馬嘶”，四時祭祀，香火不斷。³⁴ 每年農曆六月三十為三寶大神紀念日，人們傾城出

31 鄭一省：〈印尼的鄭和遺跡與印尼華人的“鄭和崇拜”〉，《東南亞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85-90。

32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56-158。

33 曾玲主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頁 166。

34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81-184。

動，旌旗蔽野，鑼鼓喧天，抬著三寶大神像大出行，信眾通過舉行儀式來紀念鄭和，他們的關注點集中於神聖空間的某些特殊地方，如建築、樹、井、腳印等，那些反復講述和潤色的故事裏或被認為確實發生過異常事件的地方，都被罩上一種超自然的光環。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市的半山芭大街有一座三寶廟。與麻六甲、檳州、登嘉樓和沙撈越相比，這座三寶廟的建築顯得相當破舊。三寶佛神情靜穆祥和，取結跏趺坐姿，端坐在束腰蓮花座上。衣褶流麗，雙手合十，給人虔敬和親近感，整體上應屬準佛裝型（圖 13）。三寶佛前的神位牌上寫着：“敕封特使招討大元帥三寶公神位”。供桌上方的對聯是“佛法靈通五嶽蕩平開福祉；神恩普濟三江洋溢廣財源。”橫批“佛法無邊”。佛像前面和兩邊都是個小的鍍金塑像，右側是身穿官服、頭戴無簷帽的文臣，左側是身穿盔甲的武將。³⁵ 此外，馬來西亞沙撈越古晉義文宮三寶廟也有一尊鄭和神像，雖身穿明代文臣裝，但有很濃厚的佛裝型的特徵（圖 14）。1872 至 1875 年間，馬來西亞華人在古晉建義山（墳場），同時在附近建三寶廟，二十世紀 90 年代又重塑鄭和像，神龕前左右柱子上有金龍纏繞。雖身穿文臣裝，但整體造型卻有類似準佛裝型。³⁶

上述佛裝型鄭和像的例證，顯示出鄭和形象已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族群中神明結合，逐漸轉變為具有護佑當地族群功能的神靈。作為守護神的三寶像顯示中國民間信仰如何在近世東南亞入鄉隨俗，產生了與中國本土不同的形象和祭祀形態。這些流傳在域外的神像雖以鄭和命名，但其形象及精神意涵已逐漸在地化，紛紛被納入東南亞民俗傳承及宗教系統，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東南亞很多屬於非佛裝型的鄭和塑像，在造型上卻採用了接近佛裝型神格化的旨趣。

這些佛裝型和準佛裝型的神格化鄭和塑像，也成為海內外宗教禮儀祭祀等活動的一種重要勾連。泉州《山明海鑑針路》記載今浙江台州垵頭畝有“白鶴石鳥石盤大山光塔三寶王爺宮”；《乘舟必覽》稱浙江溫州樂清秀塗畝“外看三寶爺宮，搭白鶴後外。”上述三寶王爺宮、三寶爺宮，均指奉祀鄭和的廟宇。泉州惠安縣東園鎮琅山村有三寶宮，奉祀鄭姓三寶佛，作為海底神，船民出海到此祈拜，若遇風濤，海底神會將船托送靠岸。宮內有一輝綠岩香爐，正中有“光緒丙申”年間“鄭家弟子敬”刻的“三寶尊佛”。³⁷ 可惜當年的鄭姓三寶佛今天沒有保留下來。

福建省漳州市鴻漸村是曾任菲律賓女總統柯拉松·阿基諾（Maria Corazon “Cory”

35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87-189。

36 孔遠志、鄭一鈞合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頁 184-186。

37 李玉昆：〈略述海路針經記載的神靈與廟宇〉，《閩台緣》，2019 年第 1 期。

Cojuangco Aquino, 1933–2009) 的祖籍地。1989 年底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專家莊為璣 (1909–1991) 考察了該村一座為紀念鄭和和王景弘二位正使而建的廟宇。³⁸ 這座“二保廟”面積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廟內，供奉着鄭和及助手王景弘的兩尊座像，均頭戴太監帽，身着戰袍，是宦官型和武官型的結合，鄉村神廟的這種格局是多因素互動、多種信仰空間重疊的結果。廟門上有一副對聯：“著千古之功勳職封太保，濟萬民乎黎庶德重風山”。舊廟於“文革”期間被毀，1986 年由菲律賓僑胞許文忠先生捐資，在原廟址按舊廟式重建。舊廟的規制與新廟相同，但面積更大，內祀的雕像更漂亮，村民稱為“太保公廟”。³⁹ 元初，由於種族壓迫嚴重，鴻漸村百姓民不聊生，村民為求生存，便背井離鄉，遠洋逃生，紛紛循先人航道渡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至十五世紀末，鴻漸村十有八、九戶到海外謀生，且多定居在鴻漸先民居住人數最多的菲律賓呂宋島。因該村僑民經商貿易來往頻繁，四鄰鄉人稱鴻漸海外僑民“呂宋客”，俗稱該村為“呂宋村”，村民亦以此為榮、逐漸成名。為感“鄭三太保”給家鄉帶來的無限功德，據二位太保神力巨大，有求必應，明末崇禎年間由鴻漸村先民在村裏高陽榕樹邊，擇地重建二太保宮，將六甲社庵裏供奉的二位太保像，請入鴻漸村太保宮奉祀，從此安居在鴻漸村。明末清初，旅菲的鴻漸僑胞還把在南洋供奉的鄭和畫像帶回家鄉奉祀，並在該村西面建起一座小廟，供奉着鄭和及其副使王景弘塑像，俗稱“太保公廟”，並把每年農曆八月廿三日作為鄭和紀念日，隆重奉祀“太保公”。鴻漸村鄭和廟奉祀的兩位太保是鄭和與王景弘 (圖 15)。原神祇像為三尺木雕站像，一黑臉，一白臉。通常說白臉神像是鄭和；黑臉神像是王景弘。⁴⁰ 不過也有人說鄭和為行伍出身，身體壯，熟悉兵戰，應為黑臉；而王景弘熟悉航海、醫術、建築等多項技術，應為白臉。

太保公廟每年正月十五日前後三天，村民會抬着一尊神像繞境遊香。據清代白話長篇神魔小說《閩都別記》(全稱《閩都別記雙峰夢》，二十卷四百回，題“里人何求纂”) 等有關傳聞，有一次鄭和下西洋，“聞將至閩界忽然起大風吹轉回頭，眾人皆憂”、“被漂沒至風定，始能收泊山旁，不知此處何地，唯見成群白鷺往來”，於是“鄭和太監等船泊至白鷺島”。白鷺島即今天的廈門島。換言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

38 曾玲在〈一個閩南僑鄉的鄭和傳說、習俗與崇拜形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一文中對福建省漳州市角尾鎮鴻漸村“太保公”廟的田野調查中，多次述及鴻漸村太保公廟供奉有太保公鄭和”與“二保公王景弘”兩尊神像，稱鄭和一尊為紅臉，王景弘為黑臉，並有所謂“南洋畫像說”等。曾玲主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頁 92–108。

39 陳延杭：〈國內第一座鄭和廟的調查〉，《海交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40 劉芝鳳、林森泉：〈福建龍海鴻漸村鄭和廟與麻六甲閩籍華裔淵源的調查報告〉(未刊稿)，感謝時平先生提供該文稿。

在回航途中，曾遇大風被刮到白鷺棲息的海島。鄭和廟位於廈門灣北岸的角美鴻漸村，1988 年 4 月 14 日時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返鄉尋根謁祖，還特地到“鄭和廟”拜謁。而這裏供奉鄭和、王景弘二尊神像，所戴亦非宦官帽子，裝束有類似文臣兼武官。此類神像，也可在印尼爪哇三寶壟鄭和船隊登陸之地發現，為紀念鄭和當地居民抬着紅臉鄭和與白臉王景弘塑像的遊行活動的實況。為何域內漳州鴻漸村的鄭和像是白臉？而域外的爪哇三寶壟的鄭和像卻是紅臉呢？其間是否因為文化差異而導致神像臉部塗抹不同色彩，這一點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鄭和形象的神格化有其歷史原因。明初雖有限制佛教發展的措施，規定凡是出家的僧人必須要持有官府發放的度牒，否則便視為違法。此舉是為了減少和控制僧眾的人數，抑制佛教發展。但上至貴族下至百姓，信奉佛教者甚多。這些制度到了明成祖之後便有所鬆弛，違反禁令最多的當屬宮中的宦官。原本信仰伊斯蘭教的鄭和在進入燕王府後也受到佛教的影響，1403 年他受菩薩戒，成為佛門弟子，法名“福善”。佛教宣揚因果輪回之說，對於作為“閹者”的宦官，可能滿足了他們的缺陷心理。⁴¹ 佛教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決定超然塵世，離家絕世修行，與鄭和等宦官群體的生活背景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明朝宦官成為集中了較多佛教信徒的特殊群體，許多宦官不惜花費重金到處修建寺廟、佛堂，還勸說皇帝制定促進佛教發展的措施。鄭和篤信佛教，一生施財印刻多部佛經，即為明證。他在下西洋期間率人建寺、命人鑄造佛像和羅漢。海內外寺廟中保留着大量鄭和布施的記錄，而《鄭和航海圖》、《瀛涯勝覽》等文獻都列出不少佛堂。鄭和到達的東南亞，本身就是佛教重地，當地崇信佛教，鄭和更是如魚得水，到處資助建造佛寺。⁴² 隨着鄭和下西洋的事蹟被神化，各地三寶廟出現神格化的佛裝型以及近於寫實的準佛裝型鄭和塑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四、域外文臣裝鄭和像及其“去神格化”建構

在東南亞的鄭和塑像多是讚歎其功烈，漸因畏懼而生敬仰，於是歌頌其威靈。從十七世紀起，鄭和開始了神格化的過程，而神格化的塑像明顯帶有宗教性。鄭和崇拜最初形成於中國本土，之後在東南亞則發揚光大，由信奉中國傳統民間宗教的華人、信奉回教的馬來人、信奉佛教的泰國人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當地土著等族群，在東南亞共同將鄭和打造成神明。至今仍存的三寶廟(宮)以及祭祀鄭和的宗教儀式和慶典，構成了東南亞民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東南亞流傳着許多與鄭和有關的傳說。比較中國本土的鄭和崇拜，東南亞有關

41 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頁 39–41。

42 萬明：《絲綢之路上的明代中國與世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頁 583–611。